

性别的社会规范和自由选择之多元解构

——简论凯萝·邱吉尔戏剧《九重天》第一幕的叙事结构

张月琴

(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盐城 224001)

摘要:戏剧《九重天》是英国当代剧作家凯萝·邱吉尔成名力作,因其独特的社会性别观,在当代英国剧场里十分具有代表性。分析了《九重天》第一幕中出现的4个典型人物的多元化性别特征,对殖民主义男权社会中男女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性属进行了解构。

关键词:九重天;第一幕;社会规范;自由选择;多元解构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69-04

凯萝·邱吉尔(Caryl Churchill, 1938—,以下简称邱吉尔),是英国当代一位取得杰出艺术成就的女剧作家。其作品的题材以当代英国女性社会生活与生存处境为主,其创作态度则是一种对现时社会的批评。她的艺术手法也别具一格,善于打破和摆脱时空背景与戏剧场幕之间的限制,穿越界限与艺术形式的局限性。作为一名杰出的女作家,她的戏剧创作也打破了由男性垄断西方剧场的神话。

戏剧《九重天》(Cloud Nine,又译作《极乐的心境》),是邱吉尔1979年推出的一部力作,被称为是她一生中“商业成就最高的戏剧”,也确立了邱吉尔在英美话剧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九重天》的剧情其实并不是十分离奇复杂,也没有扣人心弦和惊天动地的故事发生。但由于涉及大量非主流的敏感话题,如同性恋、双性恋、多性恋和乱伦恋等,甚至在剧情中还穿插了好几处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文学评论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有的文艺家们断定,《九重天》是她“最有问题的两部戏剧”之一。从诸多对《九重天》的评议中,我们不难看出,邱吉尔带给观众们的最大困惑是,“当代社会应该为人性解放感到欣喜,还是为‘乱七八糟’的伦理关系感到担忧与恐慌?亦或是为找到出路感到欣慰?”^[1]。本文试图通

过解构主义的视角,以《九重天》第一幕为例,对剧中几个主要角色极度错乱的性别进行伦理反思,以期真正解构殖民主义男权社会中,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性属的本元。

一、克莱夫:性别压迫的忠实卫道士

《九重天》共有两幕。第一幕主要讲述的是,家长制男权社会对男女尤其是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和混乱感情背后的人性压抑。人物主要有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殖民官和农场主克莱夫 Clive、他的太太贝蒂 Betty、9岁的儿子爱德华 Edward、2岁的女儿维多利亚 Victoria、黑人管家乔舒亚 Joshua、寡妇桑德斯太太 Mrs. Saunders、家庭女教师艾伦 Ellen、旅行探险家哈里 Harry 和岳母默德 Maud。克莱夫是第一幕中的中心人物,剧中出场频率较高,剧情紧紧围绕着以克莱夫为中心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内部布景开展。在男权意识统治的维多利亚非洲殖民世界中,克莱夫处于家庭和社会最顶层和中心位置,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这可以从他出场后,就逐一对剧中其他人物进行一一介绍体现出来。

克莱夫:这是我的家人……我是这儿人民的父亲,更是我深爱着的家庭的父亲!

收稿日期:2013-04-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2001);江苏省教育厅2010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10SJB750020)

作者简介:张月琴(1973-),女,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与英语教学。

(他介绍贝蒂出场,她由男子扮演。)

贝蒂:我为克莱夫而生活,我生活的所有目的就是达到他对妻子的要求……

(克莱夫介绍乔舒亚出场。他由白人扮演。)

克莱夫:我的家仆是我中意的仆人,聪明灵巧,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黑人!

乔舒亚:我皮肤虽黑,但心却白……我的主人就是我的阳光……白人所渴望的正是我尽力要做到的。

(克莱夫介绍爱德华出场。他由女子扮演。)

克莱夫:……我在尽我所能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爱德华:我想成为父亲所渴望的那种人……^[2]

通过以上台词可以看出,克莱夫的口吻好像是在处置由他掌控的出价待沽的商品一样。克莱夫是第一幕中唯一的男性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性属同一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殖民社会中典型的男性意志和男权意识的代言人和忠实执行者,他要求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个人举止和社会言行,都要完全符合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关于性别标准的根本意志和核心要求。另一方面,他还按照社会的价值规范,对男女社会成员的地位进行了等级上的严格区分,尤其是对于女性人物,必须要丧失自我和彻底失声,完全是为父亲、丈夫、儿子和每一个男人而生活,男人的一切就是她们生活的目的和全部内容。特别是他按照自己的愿望,定义了性行为规范和性别标准,比如,他与寡妇桑德斯太太并无多少真正的爱慕之情,甚至说有点憎恶她,但他却强迫桑德斯一直与自己保持着性关系,当他发现妻子贝蒂和哈里有染并准备私奔时,用无比惊讶的口吻和极为恶毒的言语,指责他们的感情是“黑暗的女性性欲”;对于男同性恋者哈里,他试图帮助克服他的性倾向和对自己产生的不正常的感情,但对于女同性恋者艾伦,他却始终抱着嘲笑和讥讽的态度,对她的感情嗤之以鼻。克莱夫这个按照既定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切实地映射了家长制和男权中心意识套在人们身上的社会枷锁,表达了人们试图冲破和摆脱男权对于社会性别深层的压制和禁锢,真正实现男人和女人一切平等的生活愿望。

二、贝蒂:男性换装的弱势女人

在父系男权社会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是象克莱夫这样父权制的忠实卫道者。传统男权社会的女性价值观是,妻子一定要具有对家庭忠贞、对丈夫守节、对子女慈爱、对亲友无私的传统女性美德。用克莱夫的语言就是,妻子贝蒂是他“房中的小乳鸽”和“家里的天使”。男权社会为了有效地实现对女性性别本质上的期望和控制,社会中的男性成员还制定和罗列出了一整套的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检验女性是否称职地履行了行为模式的社会要求。在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抹杀下,大多数女性都能严格地扮演男性对她们所期望的社会和家庭形象。随着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逐步地沉淀在人们的常规心理中,不但演变成现实生活中女性性别的既定内容,而且完全内化了女性的思维、固化为她们的行为准则,让女性已经不能正确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性别。在第一幕中,贝蒂和她母亲默德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如贝蒂的台词所说的,“你能看得出我是为男人而生,为男人所造……”,这时的贝蒂实际上已经成了男权文化境域中没有自身主体“声音”的“空洞能指”^[3]。

为了克服第一幕由于舞台动作的缺失和波澜不惊的对白所带来的剧情不足,针对贝蒂这个人物形象,邱吉尔进行了换装的艺术处理。贝蒂出场后,观众惊奇地发现,弱小的贝蒂是由一名高大的男性演员扮演的(这个男性演员的身高和体格超过了克莱夫)。由男人来演贝蒂,说明贝蒂完全按照男人的意愿来生活,她本人的“社会性别”已经得到她自己的基本认同,但就她“社会性别”的性属上,贝蒂阐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这从她和哈里的亲密关系以及欲与其私奔的行为上,可以看出其实贝蒂渴望拥有自己的私人感情空间,并不希望如此生活一辈子。从贝蒂的男性换装扮演,我们还能得出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论点,即为了正确地感知丈夫(同时也代表着整个男权社会)对她(当然也代表着男权社会中自然性别为女性的其他人)的要求,贝蒂必将自己彻头彻尾地转变成为一个地道的“男人”(也就是那个男性演员扮演的角色)。那么,这时候的贝蒂身上就兼有男和女两性的特点。女性的性别是自然赋予的,男性的性别是社会规范的,贝蒂身上所折射出性别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反串,同时也彻底颠

覆了克莱夫所期盼的正统礼仪标准。试想,一向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的克莱夫,每天和他同床共枕的妻子,其实是一个身着女人服装的“男人”,或者是一个具有男性思维的“女性”,这对他所奉行的男权思想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挑战呢?

三、爱德华:女性反串的听话男孩

爱德华是克莱夫的独子,他并不是《九重天》第一幕中的主要人物,只是为了配合其他人物而存在的。在传统父权制的、西方男性中心论的思维和殖民意识形态的熏陶下,爱德华在伦理道德观方面总体上还是遵循着社会的规范。比如说,在第一幕中,克莱夫为了实现让儿子成为一名“大不列颠未来的接班人”的梦想,向儿子灌输“一个男子汉应像个男子汉,男人干男子汉所应干的事”的观点,并为他设计了一系列的“有助于成长”的练习。于是,爱德华每天就努力地完成父亲布置的所有功课,时而还会去练习骑射。爱德华是一个听话的男性孩子,对于父亲的指示一一“遵命”,做应该做的、避讳不该做的。就社会性别认同上,他也尽可能地遵守社会统一规范下的“性别”守则,“男孩守则”中的“男人是特权阶级,享有女性不可企及的话语权”的说法,他也没有提出根本的异议。他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喜欢偷偷地玩妹妹维多利亚的布娃娃。

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平淡无奇的人物角色,邱吉尔进行了近乎完美地处理,让观众们真切地感受到性别属性的相承及相悖的二元对立的立场。首先,邱吉尔选择了由女孩来扮演爱德华,这当然是遵循了英国近当代戏剧中男孩应该是由女孩扮演的一贯传统。同时,一个表象上是维多利亚女王崇高事业接班人的少年,当他在家长克莱夫和他的监督机构的管理下,必然会坚定地吸收父权文化的逻辑;而当父母、家庭教师等监督机构不在场时,他内心中的本我(男女性别兼容并包)就完全释放,父权文化的“超我”约束力就失效了^[4]。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女性意识,在强大父权传统压迫的失效下,猛然间以极端暴力的方式爆发出来。不难看出,爱德华的性倾向具备着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心理是属于鲜明的女性气质的特征。第一幕中,爱德华作为一名具有明显同性恋倾向的少年,在所有换装扮演的人物中,他遭受的痛苦是最大的。这是因为,他的本性(女性的社会性属)与社会给予他的期待(男性的自然属性)相去

甚远。通过爱德华的痛苦,邱吉尔无情地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流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当痛苦上升到难以忍受的极致后,他就大声疾呼“我恨我的父亲”。尤为甚者,当他发现乔舒亚用枪瞄准克莱夫,准备射死他时,他居然假装视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行为的实施,而不去提醒父亲予以提防。

四、乔舒亚:白人扮演的黑人奴仆

乔舒亚是一个为克莱夫及其家庭服务多年的黑人管家。邱吉尔把第一幕场景设计在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并适时地创造乔舒亚这样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黑人角色。乔舒亚是一个持有白人的价值观的黑人,他抛弃自己种族的文化根源,将白人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内化,全盘接受西方的观念。在性别认知的准则上,他信奉西方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观点,认为女人是说谎的蛇,是恶魔的化身,更是一切原罪的制造者,只会给男人带来麻烦。在对待男女的态度上,他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男主人克莱夫,一再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哪怕是遇到爱德华这个小男孩,只要他有要求,乔舒亚都会不折不扣地听从和执行。但当女主人蒂安排他做事时,他总是找出若干理由推脱和搪塞,甚至会出言不逊地侮辱她。单从表象上看,乔舒亚似乎并无社会性别观的异化,也没有受到错乱性别角色的困扰。但当我们以下两幕场景联系,对乔舒亚的人物特性进行深度剖析时,就会发现他有“超性别定位”的人性颠覆问题。

第1幕场景是他对待自己父母被害这件事的态度。在一次土著部落的冲突中,他的父母不幸身亡。作为主人,克莱夫去安慰他,并让他休息一天去参加父母葬礼。谁知他却说,“我的父母都是坏人”,并表示所有黑人都是他的敌人,似乎对父母的死毫不在乎;还说,“你就是我的父母”,向自己的主人表达对白人统治者的无比忠心(性别的界定由此上升为种族的问题)。

第2幕场景是他给小爱德华讲述黑人文化中“创世”的故事。他告诉小爱德华,非洲人所相信的万物的起源是,世上一切物种都由女神创造的(绝非是西方的上帝)。女神创造了太阳和地球,她在感到孤独时流淌出的眼泪汇聚成了河流、树神追求女神时无意中用泥巴创造出了月亮、女神和树神的爱情结晶诞生出了黑人……爱德华随即提出抗议说,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因为它和圣

经里说得完全不一样。乔舒亚立即改正说,“当然不是真的,这是个糟糕的故事,亚当和夏娃才是真的”^[5](性别的界定也由此上升为信仰和信念问题)。

由此看出,邱吉尔之所以塑造乔舒亚这个角色,并用纯种白人换装扮演,其用意在于,想通过乔舒亚受到的殖民压迫和女性受到的性别进行横向比较,并利用殖民压迫(当然用殖民压榨更为准确),来进一步比拟和形容女性性别压迫的苦难情形。但就是这个在白人主子面前无比顺从,对白人文化和价值观无条件认同的黑人奴隶,他的内心却有着外人无法透视出来的劣根性。特别是到了第一幕最后一段场景——哈里与艾伦的婚宴上,他酒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对克莱夫举起了枪,表现出了黑人本性中的冷血、狂暴和残忍,更体现出黑人对白人事实上的仇恨。当然,假如邱吉尔再能够以一名漂亮的(或者是丑陋)白人女性来换装扮演乔舒亚,那样戏剧的意蕴就会更加耐人寻味了。

克莱夫、贝蒂、爱德华和乔舒亚是《九重天》第一幕中四个较为经典的人物。除了克莱夫没有做任何艺术处理外,邱吉尔运用了大量的角色换

装表现手法,贝蒂是男扮女装(性别换装),乔舒亚是白扮黑装(种族换装),爱德华是成年女性扮演小男孩(年龄换装)。通过换装手法探讨身份界定和“社会性别”界定的人为性这一主题以及不同时代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倾向,是邱吉尔以一名女性剧作家的视角,对性别、身份和性取向等社会热点问题地较早预见。这部剧首映三年后,也就是 1982 年,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困惑》(Gender Trouble)一书。

当然,在第一幕中还有另外一些人物,如由玩具娃娃假扮的没有生命力的维多利亚,她的寓意是被男权社会彻底失语的道具和玩偶形象,桑德斯太太为了追求自我个性张扬,对等级和差异社会秩序进行的不懈抗争的人物形象,艾伦(可以对应第二幕中“林”)和哈里(可以对应第二幕中“杰瑞”)这两个同性恋者的最终举行传统的婚礼,都是很有意味的。本文对被现实世界价值观念等级化、边缘化的性别结构进行解构,可以帮助读者认清和了解性别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钱激扬. 历史叙事的“断裂”与“连续”——解读《极乐的心境》[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1): 116 - 124.
- [2] Churchill, Caryl. Caryl Churchill Plays: One (Owners, Traps, Vinegar Tom, Light Shining in Buckinghamshire, Cloud Nine)[M]. London: Methuen London Ltd., 1985.
- [3] 刘永杰. 《九重天》中性别角色反串的女性主义意图[J]. 戏剧, 2006, 120(2): 59 - 66.
- [4] 丁敬芝. 论卡瑞·丘吉尔的《九重天》中性别属性的不确定性[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7(2): 58 - 61.
- [5] 楼育萍. 性别的追问——对卡瑞·邱吉尔《九重天》的女性主义阅读[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06, 26(1): 63 - 66.

A Diversified De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orm and Free Choice of Sex ——A Key Study of the First Act of Caryl Churchill's *Cloud Nine*

ZHANG Yue-qin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Abstract: *Cloud Nine* is Caryl Churchill's masterpiece.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lay in England for its unique social sex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versified sex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typical characters appeared in the first act. It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in the colonial society.

Keywords: *Cloud Nine*; the first act; social norm; free choice; diversified destruc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